

內蒙文革實錄

「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

啓之 著



書 名 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

作 者 啓 之

責任編輯 孫立川

特約編輯 余汝信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 版 天行健出版社

香港黃竹坑道新興工業大廈15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出版日期 2010年1月初版／ 6月第二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N PUBLISHING CO. 2010

ISBN 978-988-17515-8-4

目 錄

序一：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沈邁克 / 7

序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何 蜀 / 10

序三：民族的不幸源於政治的不幸 徐友漁 / 13

前言 千秋易過，文革罪惡難消 / 17

第一章 背景 / 25

一、三種選擇，一個歸宿 / 25

二、路線鬥爭：內蒙與北京的恩怨 / 56

三、民族矛盾：兩種民族主義 / 73

四、權力之爭：烏蘭夫的「宗派主義幹部路線」 / 90

附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 / 100

第二章 發軔 / 103

一、前門飯店會議：烏蘭夫落馬 / 103

二、首府의 動亂：兩派之爭 / 123

三、蒙古族的厄運與抗爭 / 139

附錄一：劉少奇、鄧小平與烏蘭夫的談話記錄 / 145

附錄二：中共中央批轉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 / 152

第三章 奪權 / 165

一、兩派奪權 / 165

二、內蒙與北京的「重慶談判」 / 181

三、軍區的反抗：「全力對付北京」 / 195

附錄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 / 211

附錄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 / 212

第四章 挖肅（一） / 215

一、「三套馬車」，「第四階段」和「三股勢力論」 / 215

二、雪球效應：從「老內人黨」到「新內人黨」 / 228

三、烏蘭巴干等人與「揪叛國集團聯絡站」 / 242

四、「清隊」、「反右傾」：造反派的分化與消亡 / 264

第五章 挖肅（二） / 283

一、滕、高合流與「以夷制夷」 / 283

二、群眾專政 / 289

三、「擴大化」 / 309

第六章 挖肅（三） / 323

一、「九月暗流」 / 323

二、「把敵人統統挖出來」 / 338

附錄：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文件《關於對待「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的若干規定(草案)》 / 357

第七章 「成果」 / 361

一、「挖肅」「優勝」記略 / 361

二、喪鐘為誰而鳴？ / 382

附錄一：滕海清、吳濤、李樹德三同志的檢查 / 399

附錄二：中共中央5.22批示及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呈報的《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 / 402

第八章 戡亂 / 407

一、第二次大亂 / 407

二、肢解內蒙：區域變更 / 418

三、「征服者」：分區全面軍管 / 430

第九章 殘局 / 441

一、集中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 441

二、批林批孔中的異端：批大漢族主義 / 452

三、內蒙城鄉的「資本主義復辟」 / 465

四、落不實的政策 / 472

第十章 善後 / 477

一、第四次落實政策 / 477

二、「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 / 486

三、清查面面觀 / 498

四、公審烏蘭巴干 / 517

附錄：內蒙古黨委呈送中共中央的《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挖「新內人黨」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及華國鋒的批示 / 523

第十一章 影響 / 527

一、民族民主思潮的興起 / 527

二、1981：28號文件引起的蒙族反抗 / 533

三、區黨委的對策與蒙族的呼聲 / 542

四、蒙族學生代表團赴京上訪 / 550

五、秋後算賬 / 557

附錄一：中共中央關於轉發《中央書記處討論內蒙古自治區工作紀要的通知》 / 570

附錄二：內蒙古蒙族學生對中共中央28號文件的意見書(摘錄) / 573

結語：走向民族和解 / 577

後記 / 581

參考文獻 / 587

序一：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 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沈邁克

啓之先生的無比詳盡的內蒙古文革史終於要問世了，從我首次有幸去閱讀那一大捆沉甸甸的手稿的那一刻——那時個人電腦在中國還十分罕見——我就一直默默地期待着這一天的到來。

這本書的初稿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你，親愛的讀者，看到的則是一部經過修改、重寫以及知性升級的必讀的大部頭。作者的學識是如此地令人敬畏，以至於我當年不能不選取其中的一部份，竭盡所能將其譯成一部未定稿的小冊子——《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選於一部尚未發表的歷史著作》。作者署名 W. Woody。拙譯出版後，西方研究現代中國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中國季刊》發表了一篇書評，對拙譯做了較高的評價。迄今為止，該書評仍是唯一一篇針對一部「未定稿小冊子」而不是正規的「書」登載在《中國季刊》上的文章。這一事實充份地說明了將這一被期待的史書付梓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啓之的著作不僅在文革文獻上填補了對一個特殊的政治、社會以及民族複雜性地區的空白，而且在中央與地方、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的學術研究方面也具有令人矚目的貢獻。

在中國內外，人們常說，最好的文革研究在海外，因為那裏的中外學者都生活在一個很特殊的智力環境——即所謂「西方」。我從來不相信這種說法，啓之關於內蒙古文革的著作，以及他對文革與中國電影的關係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歐洲的學者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發生了甚麼」有全局性的認知，並像他那樣敏銳地分析出「這些都意味着甚麼」。

毛澤東曾說過，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的中瑞兩國人民有着共同的願望。我想說，回顧歷史，我們同樣享有另一種共同的渴望：忠實地記錄歷史，並將其傳給後人。正是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這本書具有難以誇大的價值：它是最具權威的歷史，它有經過嚴謹研究後寫出的引人入勝的生動故事，它的實證根據重比泰山。

隆德大學
語言與文學中心
2007年8月2日

附原英文序

Introduction

At last!

Qi Zhi's definitiv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is about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I have silently anticipated this moment ever since I first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reading the hefty bundle of handwritten manuscript pages it consisted of back in an age when personal computers were still few and far between in China.

So impressed was I by that first text—which has since been amended, reworked, and intellectually upgraded to become the Must Read Tome that you, dear reader, hold in your hands—and so awed by the scholarship of its author that I was compelled to produce a rough translation of parts of it,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xtracts from an Unpublished History* by "W. Woody" is still the *only* humble "occasional paper" ever to be the subject of a book review proper in that most authoritative forum of foreign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positive review of the "extracts" spoke volume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lete history then anticipated and now finally appearing.

Qi Zhi's work fills not only a major gap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 region of exceptional political, social, and ethnic complexity, but also constitutes a provocative contribution generally to the literature on central-local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It is often said, inside as well as out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that the finest scholarship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being done overseas, by Chinese and non-Chinese scholars working in the privileged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the virtual "West."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is not to be true, and Qi Zhi's work on Inner Mongolia, as well as his no less impressive research on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mpacted on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been one of the reasons why. Only very rarely are we in Europe able to match his degree of encyclopaedic knowledge of "what happened" with perceptive analyses of "what it all means."

Mao Zedong once observed, looking toward the future, that the people of Sweden and China share the same desire—for world peace. Looking toward the past, I suspect we share something else too, namely a desire to see our histories truthfully recorded and handed down to those who may one day think of us as their ancestors. It is on this point that I believe that the value of this book is difficult to exaggerate: it is "definitive" history as its best, an engrossing thick narrative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nd made to rest on an evidential foundation as heavy as Mount Tai.

Professor MICHAEL SCHOENHALS
Centre for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Lund University

序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許多紅衛兵、造反派組織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都有一個常演不衰的保留節目：歌舞《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舞台上，男女紅衛兵（有的着軍裝，有的着蒙族服裝）邊唱邊舞，做出騎馬奔馳狀跑圓場，滿臉是喜悅幸福的神情，歌中唱道：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從草原來到天安門，
無邊的旗海紅似火，
戰鬥的歌聲響入雲……

這首歌因其草原風味加上曲調優美，節奏明快而膾炙人口，並被國務院文化組選入了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1972年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而出版的《戰地新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創作歌曲選集》。

當各地的文藝宣傳隊員及普通民眾唱着哼着這首歌的時候，他們大多不知道內蒙古正在發生着甚麼，當然更不知道在那「戰鬥的歌聲響入雲」的背後，內蒙古草原正在上演着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歷史大悲劇——「挖肅」。當時，「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各地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除去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統一展開的清隊、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等階段性整人運動外，文革浩劫在各地的表現又各有特色，如天津的批判「黑會」、「黑戲」，湖南的「圍剿黑三線」，湖北的清查「北、決、

揚」，黑龍江的「反右傾」，四川的「批清」，雲南的「劃線站隊」，廣東、廣西的鎮壓「反共救國團」……在各地的「特色」運動中，內蒙古的「挖肅」無論是持續時間之長，還是打擊面之廣，手段之殘酷，影響之惡劣，後果之嚴重，均够得上「名列前茅」。

本書就是這一歷史大悲劇的真實記錄。

在本書之前，已經出版過另一本同類題材的書：圖們、祝東力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從該書的標題即可看出，它將製造內蒙古文革大悲劇的罪魁確定為康生。這對於能够獲准公開出版的有關文革歷史的著作來說，確是煞費苦心的。因為官方定下的調子就是如此。為適應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官方的說法發生過變化，但有一個最根本的不變的原則：不能觸及真正的罪魁。在剛開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1978年4月20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呈送中共中央的《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挖「新內人黨」問題的意見的報告》中稱：「這一錯案的禍根是林彪、『四人幫』，責任在原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後來，隨着歷史真相的廣為人知，把罪責籠統地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似乎說不過去了，於是就變成了「兩案審判」中的說法。在1980年11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和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都把造成內蒙古人民大災難的罪魁判定為康生、謝富治。有趣的是，《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書，把這些不同的說法都排列在正文前面，不知是為了表明該書的主旨還是表示「立此存照」。

此書則完全擺脫了官方調子的束縛，從歷史的真實出發，堅持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以來的良史傳統，不為尊者諱，不為權貴隱，秉筆直書，通過大量歷史資料和採訪記錄，向世人揭示了內蒙古那場歷史大悲劇的真相，並得出嚴肅的結論：「民族和諧的前提是民族和解。民族和解的前提是弄清真相，伸張正義，責任人承認罪責，對受害人公開賠禮道歉，並向社會保證永不再犯。弄清真相就是要弄清楚文革發生的機制和原因，伸張正義則是要追究發動、領導文革者的責任，懲辦『挖肅』運

動的直接責任人。文革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運用國家機器進行的一場政治運動。追究發動和領導文革者的責任，首先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追究使毛澤東『無法無天』的制度的責任。在黨國一體的中國，毛澤東是國家的最高領導者，他是以國家的名義、通過國家機器發動文革的。因此，追究發動、領導文革之罪同樣也是追究『國家之罪』。」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是，不僅深入研究了文革時期內蒙古歷史大悲劇的來龍去脈及其主要發展過程，還從更廣闊的歷史大視野的角度，將筆觸往前延伸到了文革之前以至民國以前內蒙古草原上民族糾紛的淵源，往後延伸到了文革之後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遺留問題及由此引發的學潮……毛澤東曾經斷言：「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真實的歷史恰恰相反，在那些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背後，常常反映出來的是民族矛盾問題。而毛式「階級鬥爭」運動，只能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更加複雜化，更加難以解決，最終兩敗俱傷。因此，本書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對文革歷史的研究。對於關心民族問題的人來說，本書也值得一讀。

我是通過王年一老師認識本書作者啟之的。王年一老師在給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他，說他除了講學、寫劇本和電影研究論文外，「還寫過關於內蒙內人黨的專著，此君對人十分熱情。」本來王老師是準備為本書作序的，但不幸因疾病的原因，還沒等到啟之將書稿最後修改完成，王老師就永遠放下了手中的筆。

我因對文革歷史研究的興趣而與啟之成為朋友。在讀他這部書稿時，深為他嚴謹、執着的治史態度所感動。一個外地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弄清內蒙古那段「被掩飾的歷史」當作自己的事業，且不說這是甚麼精神，只要想想其中的艱辛與風險，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

我們常用一句古訓來告誡東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實，這一古訓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是需要時時記取的。本書的出版，即可成為防止歷史悲劇重演的「後事之師」。

2007年10月17日
於重慶風江閣

序三：民族的不幸源於政治的不幸

徐友漁

啓之著《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內蒙古的大悲劇的真實說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對中國人民而言是大悲劇、大慘劇，而內蒙古地區的人民，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其悲慘尤為深重。因為這裏除了全國普遍發生的批判鬥爭「階級敵人」、「黑幫分子」，不同派別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1967年「二月逆流」中的鎮壓之外，還發生了所謂「挖肅」運動即清查「內人黨」運動。僅據官方公佈的數字，這場運動導致「在全自治區共挖所謂『內人黨』346,220人，刑訊致死16,222人，致嚴重傷殘87,188人」。雖然後來官方的正式立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由於當局不願意面對歷史，特別不願意承認迫害少數民族的事實，所以關於內蒙古的文革歷程，存在許多含混不清、撲朔迷離之處，對於文革中發生的慘劇，存在嚴重的隱瞞和歪曲的說明。

本書的價值首先在於對內蒙古的文革歷史作了忠實的、全面的描述。通過此書，讀者不但可以看到文革烈火迅速燃燒到內蒙草原，工作組短暫的領導一切，群眾組織的興起及其派別鬥爭，1967年2月軍區對造反派的鎮壓等等文革中全國各地普遍發生的現象，而且還能了解到軍人公然抗命，周恩來和其他中央大員多次在集會上被起哄攻擊，中央下令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以及把內蒙古肢解成五部份勉強維持領導和控制等不同尋常的情況。中國區域遼闊，民族成份複雜，文革中既有政令高度統一的一面，也有不同地區——尤其是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呈現獨特性的一面，啓之依靠大量翔實的材料——包括很多一般人無法

接觸的內部材料、自己親自採訪作的記錄——復原了內蒙文革的曲折、複雜、慘烈的歷史。看得出來，作者在內蒙的生活經歷，他與蒙族各階層人士的密切關係，對於他的寫作，對於他有能力對歷史事件的性質做出正確判斷，起了重大作用。

本書不但對內蒙文革作了迄今為止最客觀和全面的描述，而且為理解內蒙文革提供了相當有深度的歷史和背景材料，這包括近代以來內蒙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內蒙民主力量和共產黨力量的崛起，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前和之後對內蒙政策的變化，還包括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蒙族共產黨首領烏蘭夫態度和處理，尤其是作者着力描寫的、與文革發動同步的「前門飯店會議」——在此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判了烏蘭夫的政治死刑——這一切使得讀者有可能對內蒙文革作一種透視。本書對於蒙族學生在1981年發動學潮的記載既提供了難得的信息，也為理解內蒙文革的後果與影響提供了線索。

如實地反映悲劇很難，而正確地認識悲劇發生的原因則更難。這種難度的表現之一是，哪怕是那些有親身經歷的受害者，也人云亦云地把悲劇的發生完全歸咎於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作者尖銳、明確地指出，扯上林彪純屬胡說八道，「四人幫」和康生固然有責任，但他們都不是悲劇首要的、直接的製造者，真正的元兇是毛澤東，是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本書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是毛和中央對以烏蘭夫為首的蒙古族幹部和群眾加上的「民族分裂」的罪名，造成了草原上巨大的慘劇。

根據本書的描寫，內蒙文革充份說明，毛澤東和最高統治集團使中國的政治生活活像絞肉機——這也是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說法，除了毛本人，任何人都沒有逃脫覆滅的命運。整烏蘭夫的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很快垮台，附和華北局整烏蘭夫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軍區的幹部沒有逃脫被整肅的命運，對軍人鄭維山下令以「征服者」身份入主內蒙的陳伯達和鄭維山本人成了「反黨集團」成員，「挖肅」運動的直接指揮者滕海清最後落得備受煎熬，甚至在「前門飯店會議」上代表黨中央處理烏蘭

夫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文革剛開始不久就被列為中國頭號和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然，面對這無可逃遁的大悲劇，作者還是清醒和悲憤地指出：「文革使一切都變成權力祭壇上的犧牲，然而，滕海清等人失去的只是封爵受賞，造反派失去的是青春年華，『挖肅』的受難者失去的則是生命。」

作者在描寫和反思內蒙古的文革悲劇時，徹底擺脫了大漢族主義情緒，他把發生在一些蒙漢族雜居區的暴力事件直截了當地稱為「民族迫害事件」，本書不但揭露了內蒙古人民在文革中遭受的政治迫害，而且揭露了蒙古族人民受到的民族迫害。可以看出，民族不幸源於政治的不幸。

人們容易輕率地使用「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我們從未聽到對內蒙慘劇有公開懺悔，從未見到公開道歉的情況下，我們怎麼相信歷史翻到了新的一頁？

2007年11月2日
於北京寓所

前言

千秋易過，文革罪惡難消

1968年10月14日，下午一點鐘，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問到會的人：「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人們面面相覷，毛澤東自問自答：「我看50年、100年之後，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¹ 毛澤東講話的特點是，有時在不經意間說些心裏話，有時極認真地道出的卻是假語卮言。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毛澤東把文革說成一個小插曲，是對其造成災難的自慰與慰人。他在臨終前對自己一生的評價表明，在他的心目中，文革與建國是同樣重要的大事。據說，這句話讓胡耀邦一夜未眠，成為他否定「兩個凡是」的精神動力。² 然而，不論是鄧小平還是胡耀邦，不論是中共第三代還是第四代領導人，都難以正確地估計這個「小插曲」對中國的影響。

內蒙古為此做了證明。

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於1947年5月1日，是中共建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其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按市畝計算，它的土地面積合17.7億畝，居全國第三位，其中耕地8千萬畝，居全國第六位。天然草場13.2億畝，佔全區總面積的70%，佔全國草原面積的27%，居全國首位。其資源豐富，以「東林西鐵，南糧北牧，遍地有煤」著稱。其邊境線長4,221公里，北部與蒙古、蘇聯接壤，東、南、西三面與黑、吉、遼、晉、冀、陝、甘、寧八省區毗鄰。文革前（1965年）人口1,296.4萬，其中漢族約1,130萬，蒙族144.5萬，回、滿、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少數民族

1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第151頁。

2 同上。